

香山人短论一组^①

为什么是徐荣村？

如果不是参加 150 年前的伦敦世博会，他过去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如果这次不是在上海举办世博会，将他的有关历史挖掘出来，他现在肯定还不会有这么大的名气。由于他与世博会的特别关系，报纸、杂志、电视、因特网上，随处可见徐荣村的名字。这个活跃在上海的香山人，赢得了“中国世博第一人”的美誉。

徐荣村(1822—1873)的故事并不复杂，但是，这一故事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却极不寻常。

最显而易见的是，对他个人来说，湖丝获奖，扬了名声，拓展了商机。对今人来说，证明从 1851 年的第一届伦敦世博会开始，中国人就已经参与其事，为上海申办世博会提供了有分量的砝码。

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的思想文化层面来说，徐荣村现象更值得研究。

伦敦举办世博会，英国是很希望中国参加的，然而，清朝政府漠不关心，毫无兴趣。那时，尽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八九年，从国家层面上来说，统治阶层还是缺乏国际眼光，缺少现代意识，对西方发达国家了解甚少，对世博会这类活动的意义更没有了解。在此背景下，他们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将世博会称为“赛奇会”，就毫不足怪了。但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方不同层面的人对国际知识的了解，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并不都像统治阶层那样颟顸无知。在此之前，魏源已经在编《海国图志》，徐继畲已经在著《瀛寰志略》，广东人梁廷枏已经出版《海国四说》，他们对于西方情况都有比较清晰、比较准确的了解。那些很少留下文字记录的活跃在洋行的中国买办，或通过直接接触、或通过报纸杂志、或通过道听途说，对西方情况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了解。徐荣村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参加了世博会、留下了文字记录和奖牌，使我们今天得以了解的情况，我想，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对伦敦世博会有所了解的人一定还会有一

① 2010 年春，为配合上海世博会举行，《珠海特区报》推出珠海人在上海的专栏，约我写专栏评论，于是有了这组短论。论述的人物为徐荣村、容闳、唐廷枢、徐润、唐国安、唐绍仪、苏曼殊、杨匏安、苏兆征与蔡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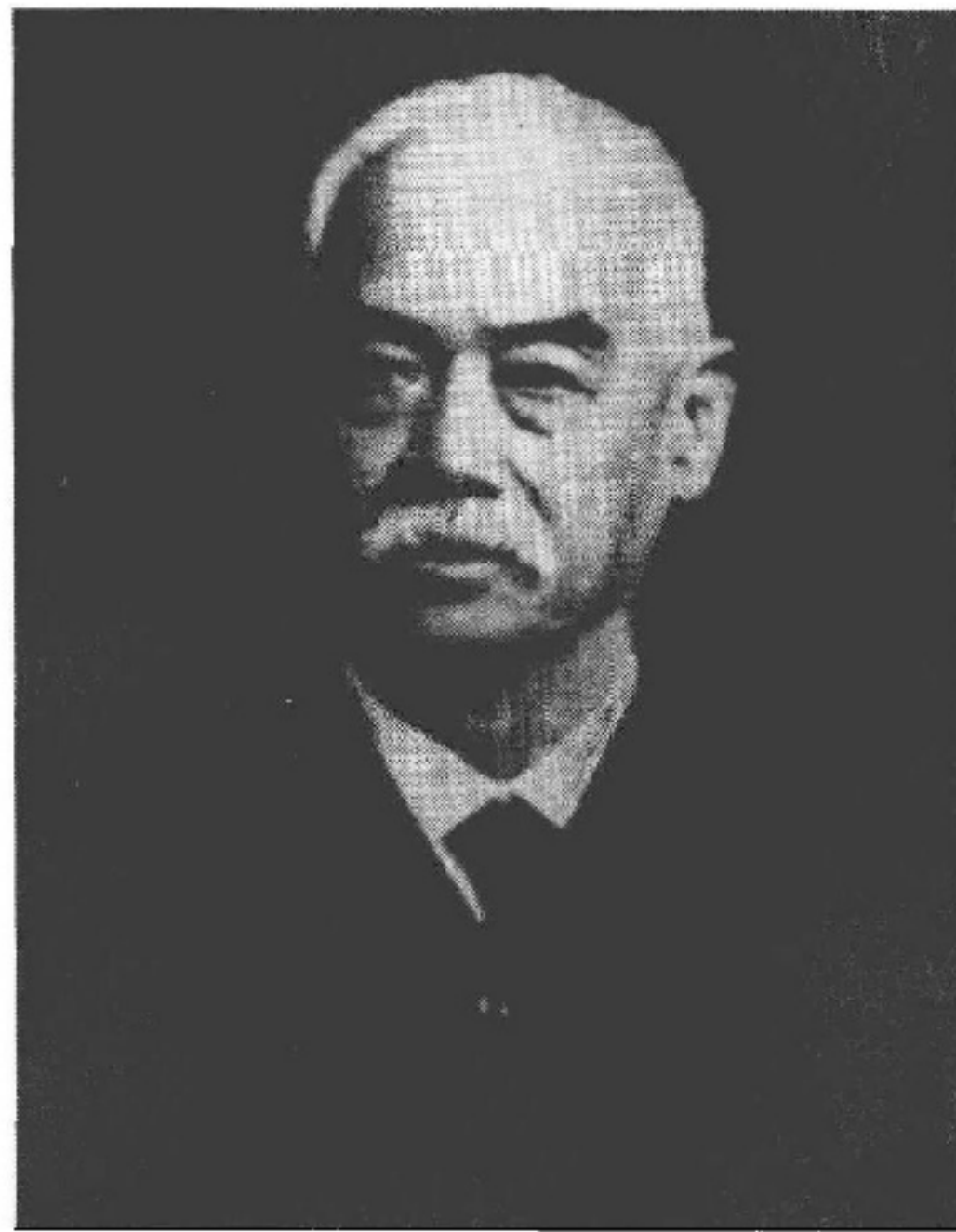
些。徐荣村的故事,说明中国社会确实有那么一些眼光远大、思想开明、富有世界知识、脚踏实地、很会办事的人。徐荣村参加世博会,在思想文化史上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那么,为什么是徐荣村参加世博会并获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我以为,这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自葡萄牙人在明代占领澳门以后,香山一带就处在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前沿,那里的中国人,对西洋文明接触最多,了解最切,最肯学习。鸦片战争前后十多年间,对西方新生事物信息灵敏的人,主要是这一带人,特别是买办。近代买办有广东籍、江浙籍之分,但那时候江浙买办还没形成气候,活跃在洋行里的买办主要是粤人,特别是香山人。所以,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中国要么没有人参加,如果有人参加,可能性最大的是香山买办。至于香山买办中,究竟哪一位会参与,那就要看其人之商业敏锐性和行事果断性了。徐荣村善于学习,感觉敏锐,行事果断,经商诚信,讲究质量,所以他成了“中国世博第一人”。

容闳:坚韧不拔先行者

1912年,84岁的容闳(1828—1912)长眠在美利坚土地上。他早已加入美国籍,但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遥远的中国,劝自己的孩子回到中国去。他洋装穿在身,心是

中国心,难怪美国报纸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1855年,27岁的容闳在离开中国8年后,重新回到这块他魂牵梦绕的土地上。他此前所接受的教育,几乎都是西式教育,包括他在澳门马礼逊学堂的6年。他对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的了解,远远超过对孔子、老子、曹雪芹的了解。他能用英文流利地写出博士论文,但不能用中文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他还是要回来。他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使自己的祖国变得文明而强大。为了这个目标,他补习中文,以当翻译糊口。他拜访过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一系列除旧布新的变法主张。他晋谒过位高权重的曾国藩,提出采买



容闳照片

机器、兴办工厂、兴办教育、派留学生等建议。在民族危亡时刻,他在上海参加过旨在保全中国自主、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的“中国国会”,最后遭到通缉。他还支持过革命领袖孙中山。

如果他像黄宽那样,学的是医科,回国以后,他会是位名医。如果他学的是工科,回国以后也能有一些用武之地,比如詹天佑。他学的偏偏是文科,西方文学,拿的是文学博士学位,那是在晚清时期与中国文化相容性最低的学科。如果他回国以后,在某个教会学校谋个教职,教授西方文学,那也可以学尽其用,温饱不愁。但是,他志不在此,他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这样,等待他的,就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与失败。容闳的理想有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实现,但大多落空。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他的理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才得以完全实现,他的名字也在这个时代最为闪亮,被认为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先行者!

唐廷枢:买办长怀爱国情

四十岁以前,唐廷枢(1832—1892)读过6年教会学校,当过10年英语翻译,干过10年洋行买办。他说得一口流利英文,编过学习英文的《英语集全》,熟悉外国人,通晓西方文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是在西方文化浸润中长大的。在学习西方文化、与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拓宽了视野,历练了才干,积累了财富,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弊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不少短处。另一方面,他的爱国意识也在潜滋暗长。他不能容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不能容忍洋人对华人的蔑视,不能坐看中国利权的丧失,不能坐视中国继续地衰败。1873年,他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举动,辞去已经驾轻就熟、待遇极为丰厚的怡和洋行买办位置,就任成立不久、没有任何起色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自己没有细说。他的好友郑观应倒是说过其中的原委:有一次,唐廷枢乘船由上海返回香港,途中遇到风浪,其船避风,洋人船主限给每位乘客一壶水,约重一磅,饮用洗面均在内。船中有一百多头羊,则满桶水任其饮用。唐廷枢受此人不如羊的刺激,大为愤恨,从此萌发与洋人争利的思想。他任职轮船招商局,目的之一就是挽回利权,与洋商争利。

魏源有一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唐廷枢将此名言落实到行动中。他负责轮船招商局之后,努力引进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增强招商局的商办比重,扩大资本,加强管理,改善经营,使得业务大为扩展,不到十年,招商局已拥有江海轮船26艘,中国少溢出白银不下数千万两。他主持开采开平煤矿,开创华商保险业,也都实行先进的管理

制度,大获成功。

唐廷枢既是著名的买办,又是成功的民族资本家,还是卓有成就的爱国者!他在努力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强烈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他在努力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对于官僚体制下的种种腐败行为痛心疾首。其兄唐廷植的工作经历、思想境界,亦与唐廷枢相似。唐氏兄弟是晚清极具研究价值的个案,现在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但还远远不够。

徐润卓识坚韧

徐润(1838—1911)的成功,根基于卓识、坚韧四个字。

他15岁到上海洋行当学徒,很大程度上是受环境与家族的影响,家乡人在上海洋行干事的很多,伯父、叔父都是以当买办而发迹的。但是,他到洋行以后,由学徒、而副账房、而副买办、而买办,则是他苦学历练的结果。他经营丝茶,很大程度上是从众行为,那时很多买办都在经营这两样商品,利润也高。但是,他经营轮船、矿务、钱庄、房地产、保险业,则是他的卓识所在。他经营房地产,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买三千多亩地,盖那么多房子,投资二百多万两银子,没有对市场前景准确的判断是很难想象的。特别是经营石印业,那时还是新兴产业,很少买办出身的人经营此行。影印《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佩文韵府》、《全唐诗》与《康熙字典》这些典籍,既赚钱,也传播文化。这是徐润高明的地方。

徐润的卓识,也表现在他善于学习方面。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中学、西学知识均靠自学而来。他自称,“向明即起,夜分而寝,以余暇读书自励”。他也很重视子女教育,将他们一个个送到美国、英国去留学,让他们学有所成。

徐润的卓识,还表现在他有通达的财富观,会敛财,也善散财,以财为己用,而不为财奴。他乐善好施,出手大方,赈灾、办学校、办孤儿院,行善事无算。1894年唐山一带大饥荒,他筹款20万两,救济灾民。他在上海、苏州、镇江、天津与老家香山等地有多处住房园林,其中在上海山东路住宅,画栋雕梁,华丽异常,门窗镶嵌大理石,地板光洁如镜,时人诤为欧西大洋房。

商海宦海都有风浪,经商当官都有风险。徐润的过人之处在于他面对风浪不气馁,挺得住。1883年随中法战争而起的金融风潮,给上海许多商人带来灾难,巨商胡雪岩即因此而破产。徐润未能幸免。招商局经营困难,自己亏空巨款,被挤出招商局,南京的书局又遭火灾,政治失意,经济困窘。在此困境中,徐润咬紧牙关,顽强挺住。用他自己的

话说：“只有一个‘定’字，立意终不负人，忍耐至今，亦渐渐过去。”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还清债务，东山再起。

唐国安：禁烟会独领风骚

唐国安(1858—1913)在上海各种活动中，名声最大的是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万国禁烟会。那次会议于1909年2月2日至26日召开，共有41名代表，分别代表中、美、英、法、德、俄、日、意、荷、葡、土耳其等13个国家。这是由美国发起、中国主办的第一次多边反毒品会议，也是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开端，意义很大。

中国政府此前从来没有举办过这样的国际会议，从会议的一些细节，很能看得出清末的时代特点。

其一，会议的地点是在公共租界汇中饭店，而不是在华界。当时的上海华界，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地方能够举行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汇中饭店是1908年刚刚落成，即今和平饭店南楼，其五楼会议室是当时上海最为现代化的会议场所，有两部电梯上下。为了这次会议，饭店对这间大会议室专门进行了装修，配有舒适的座椅，大约20张桌子，上面铺着毡毯。

其二，会议的座次，是用抓阄的形式解决的。每个代表团从一个盒子里抓一个号码，然后确定其位子。

其三，主席台后面的墙上，悬挂的是中美两国国徽。这次会议是美国发起的，中国主办的，所以并悬两国国徽。这在今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大厅两面墙上，分悬各国国旗。会议开幕，没有奏任何歌曲。只是在端方宣读中国皇帝指派他担任中国代表大臣时，全体起立。

其四，中国大臣的表现，不那么完美。两江总督端方是中国代表大臣即代表团团长。他在致开幕词时，声音时高时低，低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的讲稿准备得不那么充分，记者报道说那讲稿是皱巴巴的，上面作了多处修改和增添。讲话当中，他看到某些不合乎他心意的话，还停顿了一会，与身边的随员耳语了几句，临时作了修改。开幕当晚，中国官员举行晚宴，端方没有出席。

其五，会议用语到开幕以后还有改动。会议的语言一开始是英语，经法国代表提出争议，要求将法文也列为与英语同等的位置。后来经过讨论，决定英、法均可。除了端方在致辞时用的中文，其余人均用英文或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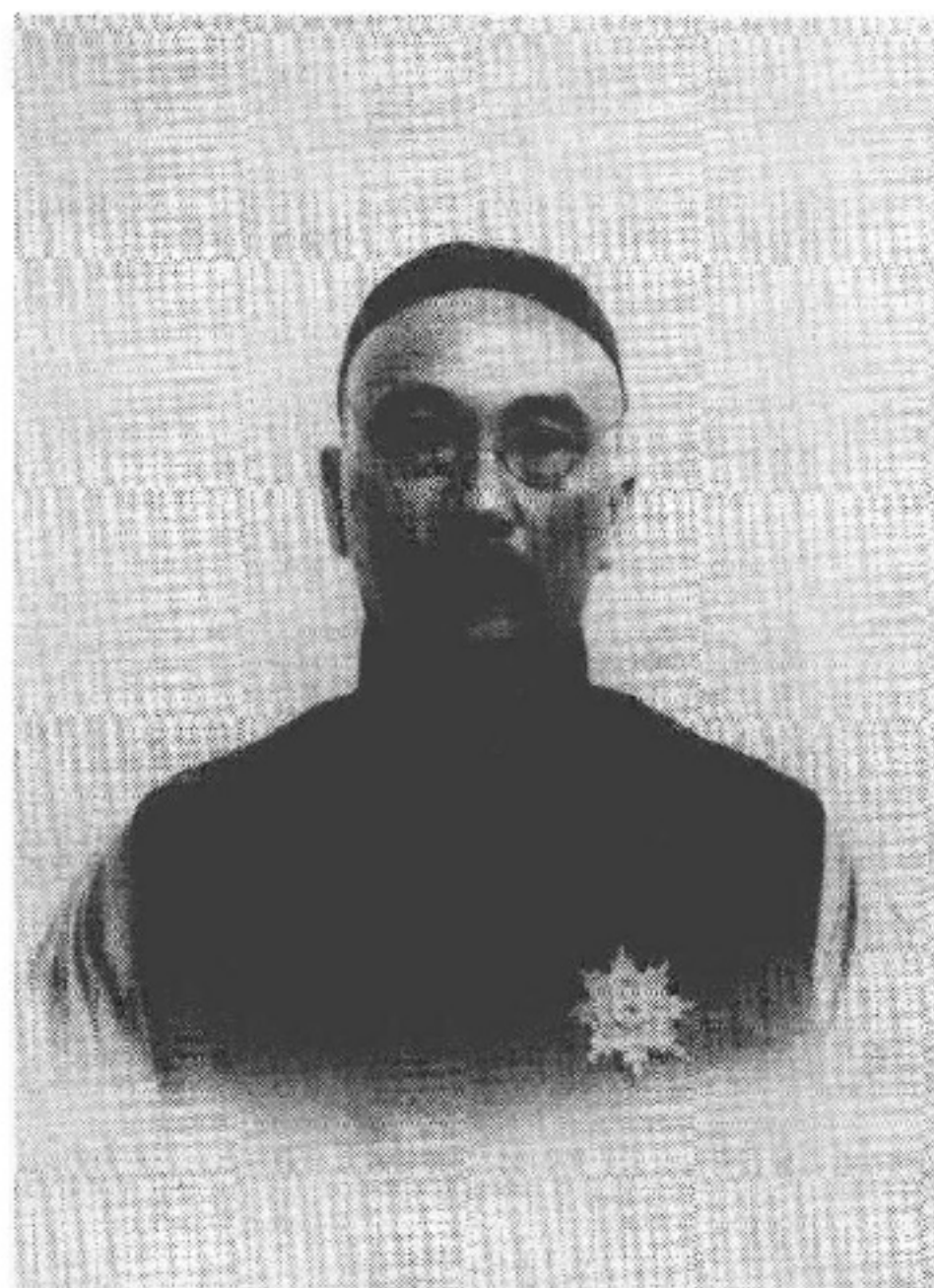
这种种情况，在今人看来，相当怪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

国家被纳入世界格局的时代特点。

在这次会议上,唐国安的表现相当出色。他兼任代表团发言人,凡是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报告、答疑、质询、讨论、提案、演讲,均由他承担。他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从中西文化的广阔视野,论证了中国政府对禁止鸦片烟毒的严正立场。他演说的英文稿被《字林西报》全文发表,被舆论界评价为“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两年后,他再次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参加了海牙第二届万国禁烟会议。

唐绍仪才识兼具

晚清留美 120 名幼童中,以日后在国内的政治声望而言,唐绍仪(1862—1938)当推第一。他的这一声望既是他在清末逐步积累起来的,也与他在清末民初鼎革之际关键时刻关键事情上的非常表现有关。



唐绍仪照片

唐绍仪在清末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一方面与他的才干、政绩有关,比如在天津海关出众的管理才能,在中国驻朝鲜总领事任上表现出来的外交才能,在中英关于西藏问题谈判中表现出来的广博的国际知识与高超的谈判才能,另一方面,与他受袁世凯器重有关。唐绍仪在清末所任之职,多属袁世凯的势力范围,袁世凯也确实对这位海归才俊刮目相看,视为心腹,不断提携。正因为如此,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南北对峙,双方在上海举行和谈,南方革命党派伍廷芳为代表,北方袁世凯则派唐绍仪为代表。作为北方代表,唐绍仪最省力的也最保险的办法,是忠实地表述袁世凯的意见,不要过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唐绍

仪没有这么做。他表述的是他自己内心认可的意见,而不是袁世凯的意见。在谈判中,他对南方作了较多让步。结果,和议达成了,他与袁世凯之间的裂缝也产生了。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他作为南北两方都能接受的人物,成了第一任内阁总理。他在此以后,如果事事顺着袁世凯,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不会加大,更不会最后决裂。但是,他按照自己的理想、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行事,包括加入同盟会,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

干入阁担任要职,坚持事事恪遵约法,抵制袁世凯的大权独揽,这些都是袁世凯断断不能容忍的。结果,他被迫辞职,与袁世凯分道扬镳。唐绍仪的坚持,来自于他的理念,共和、法制、三权分立,都是他在美国读书时耳熟能详的,也是他衷心信奉的。他为信念而辞职,所以很坦然。

唐不惜与袁决裂,源于他的自信。那次自信,成就了他的英名。晚年的唐绍仪,依然自信,这次自信,导致了他的灾难。日军占领了上海,日本派来劝降的人已经找上门来了,朋友、家人都劝他及早离开上海,但是,他就是不走。结果,死得那么惨,留下一大历史谜案。老人的自信,很容易流为固执。

苏曼殊:亦奇亦怪一情僧

1918年5月,苏曼殊(1884—1918)在上海广慈医院去世,一代天才,集诗僧、文僧、画僧、情僧、革命僧于一身,从此了无牵挂,寂然归真。那年,他才34岁。

曼殊身世奇特,命运多舛,踪迹东西南北,类若转蓬,身份认同则亦中亦日,半僧半俗,依违两可,这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

他慧根天植,记性超群,悟性绝伦,二十多岁,便通晓日文、英文、梵文,能文,能诗,能画,能译诗,能编辞典,博识多才,清奇俊逸,蜚声文坛。

他天性敏感,又胸无尘垢,待人真诚,迹近于傻,所以在他的诗歌、散文、小说中,氤氲蓊郁、充溢弥漫的就是一个“情”字,男女恋情、母子亲情、故国乡情,或郁结难纾,幽怨凄恻,或自不能禁,长歌嚎啕。偏偏这样一个多情、任情之人,作了一个断情、了情之举,遁入空门。无奈情根难铲,俗缘难断,从而演绎出那么多哀怨迷离的故事。

他从事多项革命活动,从上海,到湖广,从东京,到南洋,与章士钊、陈独秀为朋,与章太炎、刘师培为伍,受到孙中山重视,还与蒋介石同寓一屋。他参与的革命活动之多,许多专业革命家也瞠乎其后。

身世、才情、事功三项集其一身,兼之袈裟一袭,醉卧花丛,飘然而来,倏忽而去,且有时情绪失控,神经失常,怪异之举,令人侧目,苏曼殊就成为无人可以相匹的奇人,成为可以从多学科、多方面进行解读的对象。他去世以后,考究他的身世、研究他的学术的论著就不断涌现,持续几十年而不衰,他的小说还被改编成剧本。

上海是曼殊学业与事业起步的地方。他1896年来上海,学习中文与西文,两年后留学日本,1903年重回上海,参与《国民日报》工作。以后去而复还,还而复去,上海成为他出入次数最多、居留时间最长的城市,居住地点也时有变化,计有爱国女学、八仙桥、南